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1.01.008

《巴黎手稿》中精神生产思想的当代论域与实践路向

牛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的出发点,《巴黎手稿》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分析“非物质生产领域中资本主义的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揭示精神生产的主体性本质和历史性特点,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和精神生产主体性消解现象,明确私人财产占有制度是问题的根源,从而为彰显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实践指明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运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提供的理论基点和唯物史观的分析工具,分析当代中国文化生产的现实,理解资本在当代中国的精神生产实践中在场的合理性,理解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价值冲突的当代实践,从明确制度构建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化路向,完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补的生产所有制体系,建构对文化产品的价值性内容进行审查的合理机制这三个方面,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向。

[关键词]《巴黎手稿》;精神生产思想;扬弃资本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1)01-0055-08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思想理论源于特定的社会存在基础,本身是呼应现实问题的产物,其生成也离不开社会存在的实践资源。精神生产是“关于意识的生产”,其理论旨趣随着资本萌生和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要不断变迁,体现了资本运动与精神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手稿和“穆勒评注”)回应了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对资本生成及其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作用的困惑,突破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精神生产思想主体性缺失的形而上学窠臼,从经济事实出发进行哲学反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揭示精神生产的主体性本质和历史性特点,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和主体性消解现象,展望了扬弃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后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些表述相对零碎,但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来整个社会精神生产发展样态及本质的高度概括,它不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理论资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

一、《巴黎手稿》中关于精神生产的思想谱系

《巴黎手稿》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的出发点,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事实来分析“非物质生产领域中资本主义的表现”,明确“置之不理”的时代背景和未来发展可能性。对于我们思考资本

[收稿日期]2020-08-19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超越资本逻辑: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化产业价值功能实现”(2019M651409);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2019ZD03)。

[作者简介]牛涛(1979-),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基地研究员。

介入下的劳动异化和精神生产主体性缺失现象,明确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占有制度是问题的根源,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扬弃异化劳动,从而为彰显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实践指明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一)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及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马克思以生产过程是否存在资本介入、生产目的是否以资本自我增殖为依据,将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谓生产劳动“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除了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等价之外还创造新价值的劳动”^{[2]240},与此相反,非生产劳动就是指不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早期,生产力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创造物质财富能力的急剧提升上,资本对生产的大规模介入主要在物质生产领域进行。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能够在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下创造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劳动。

而在精神生产等非物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它们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不生产剩余价值,属于非生产劳动。但他并不否认非物质生产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转为生产劳动的可能。“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2]219}“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一个生产劳动者。”^{[2]219}这里的作家、演员等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当他们在资本的介入下进行劳动时,其生产的目的就是纯粹的交换,生产的产品就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此时的非物质生产活动就是生产劳动。

针对“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2]217}。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基于自身所在时代现实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技术手段,马克思将文化生产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按照事物的性质只能在某些部门内发生”^{[2]217}。在马克思看来,精神文化生产的生产行为和产品在时空上不能分离,极大地限制了资本在非物质生产中介入的范围,从而阻碍了资本大规模介入的实践。二是产品“脱离生产者而存在,因而可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间隙时期作为商品来流通,如书籍、绘画,以及所有与艺术家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非常有限地被应用”^{[2]230}。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即使在具有独立存在形式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由于现实的文化保存和传播技术手段限制,其生产的规模依然是非常有限的,资本在其中大规模的介入缺乏现实性。

其次,马克思所言“置之不理”的时代背景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此时的生产力水平虽然相较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满足大多数人较高水平的物质生活需要仍很遥远。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条件下,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在新创造的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有了与其在人口中的比例远不相称的部分,基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内在逻辑,资本家会选择尽可能地将大部分新创造的社会财富用于进一步的扩大再生产领域。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在财富分配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首要的任务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求,精神文化消费的需要被排在了等而次之的位置。社会缺乏对精神文化产品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资本在精神生产领域内的大规模介入缺乏价值变现的基本前提。因此,从传播的技术和当时的现实需求两个层面来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生产仅仅在非常狭窄的领域和非常小的规模上存在着,与大规模的物质生产领域相比,马克思的置之不理说具有特定时代的合理性。

然而,在马克思对非物质生产领域中资本个别参与的分析中,隐藏着当条件合适时资本大规模介入文化生产的可能性。首先,随着技术的进步,唱片、音像制品、硬盘等保存方式和广播、电影、电视等传播方式不断更新,文化产品独立存在的物质外壳越来越形式多样、功能强大,越来越多地可以脱离

生产者即时的行为而被保存、被重复制作,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传播。此时资本在文化领域大规模介入的产业化运作就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其次,虽然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下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依然存在,贫富差距甚至进一步拉大,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大多数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升。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基本物质生存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之后,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会急剧增长,传统的个体性文化生产远远无法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需要资本在文化生产领域内的大规模介入。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张也使得资本在文化生产领域内的介入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基于马克思对“非物质生产领域内资本主义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今天资本在文化生产领域大规模介入的现实可能和必要性。

(二)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异化对文化生产应然本质的遮蔽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异化劳动和对象性劳动问题的阐释,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艺术和诗歌之类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的论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192,193}。“我们的产品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3]37,38}“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4]51}文化产品的生产本身是人对象性劳动的过程,文化产品作为人对象性劳动的产物,其中同样固定着人的本质性力量。在劳动过程中,自然科学作为劳动的一种要素“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5]306}。在这里,马克思明确了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承载使命,即使它是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出现,也不例外。

其次,当我们把“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2]192}时,在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反映层面,作为文化形式的“艺术和文学等等”就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联系起来。“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6]168}在这里,文化是人实现自我本质的精神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6]456}。因此,文化的生产应该是人表现自我自由本质和天性的自觉的能动的活动,正如“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7]73}。人凭借艺术和文学等文化形式感知生命的本质,并在劳动的过程中以产品的形式外化人的本质性力量。

再次,“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4]51}。作为文化形态的“艺术和文学等等”的生产是一种对象化的劳动。此种劳动本应体现人的本质性力量,但在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最大化自我增殖的逻辑可能会驱动生产者聚焦于利润的获得,从而使精神文化生产成为一种异化活动,走向自己的反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51}在文化生产领域,当资本开始介入文化生产之时,文化生产就不再是自我本质的自觉表现,而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如马克思所言:“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7]73}。此种情况下,文化产品生产就可能偏离其应有的本质,片面迎合资本最大化自身利润的追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8]296}。

最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下,生产的异化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要求“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9]189}。因此,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生产关系的核心层面着手,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制度体系,扬弃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才能为异化问题的解决寻找到正确的道路。

理论是源于特定现实的需要并在特定社会的实践基础上总结而形成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关于精神生产的思想资源,在具备普遍真理性认识的同时也具有其特定时空范围的

限制性。《巴黎手稿》诞生的时代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产业化的文化生产还没有成为主流。因此,资本大规模介入文化生产的问题并没有被特别分析。但在马克思相关的理论思考中,隐涵了未来情势变化后某些合乎逻辑的发展可能,为我们今天观察和思考相关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点和唯物史观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中理解资本与文化生产的勾连与价值冲突,明确在文化生产中用社会主义制度扬弃资本的方向。

二、现实需要与价值冲突:当代中国文化生产中的资本介入

《巴黎手稿》明确了扬弃私人资本的总体方向,但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决定了现阶段无法实现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在场,市场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约束下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领域中,资本同样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但有其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领域的独有特点。文化产业作为当前我国精神生产的重要路径,不能像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那样,作为奴役人精神的工具而存在。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有效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传播和内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一)当代中国资本介入精神生产的理论辩护

人类社会群体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劳动者、生产工具等生产要素投入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其生产资源的配置方式受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决定,具有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经济手段,不具备制度属性,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10]373}既然市场存在,资本在生产中就必不可少。“市场是资本的游戏场,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经济,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1]资本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环境下生成并运行,其作用状态为其所处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资本本身只是手段,它并不是人,因而不具有道德属性,而是资本的掌握者赋予资本以道德属性。”^[12]因此,我们不能将资本本身等同于最大化自身利润的资本逻辑,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资本,其运行的目的和规律大不相同,我们“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3]493}。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利用资本的工具性逻辑,为自身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服务,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人的自由和解放。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3]9,10}《巴黎手稿》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地宣示对‘现实的历史’的否定,而是以理论的自觉把握‘现实的历史’,并为缩短和减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痛苦提供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思想”^[14]。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要求我们不加区分地消灭一切资本,而是要求我们要了解资本生成之后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发挥,区分自身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中资本的地位和作用空间来决定我们对待资本的应然态度。在资本对社会还有相当的正面作用空间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利用资本来提升劳动生产的效率,奠定解放人发展人的物质基础,同时警惕资本的负面作用,努力建构恰当的制度手段去约束资本对人的发展的负面作用,驾驭资本,导控资本作用的方向,从而努力实现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协调与统一。

马克思强调,“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5]90}。就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同样存在。无论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增长还是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都要求我们提高精神文化生产力,提供丰富且优质的精神食粮。首先,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需求在量上急剧扩张,传统的精神文化生产方式无法充分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精神文化生产能力不够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资本在精神生产中的介入就具有了现实需求的必要性。其次,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域和人群之间,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问题也日益凸显,要求精神生产要有丰富的表现形式,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党的十四大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精神生产领域中,可以引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高效配置资源,提升文化生产效率,以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急剧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精神文化生产的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研究群众的具体需求,丰富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实现精神文化生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 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价值冲突的当代实践

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具备人民性,其文化的本质是为人民大众的自由和解放服务,这也体现在我国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设计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方面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强调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但在相互勾连的文化生产实践中,文化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根本价值的冲突日益凸显。

文化是属人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目的是要彰显人本质上的创造性,通过文化浸染来发展人内在的潜能,祛除束缚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精神枷锁,从而使人实现对自我异化的扬弃。人民可以通过文化路径内化自身的价值情感、强化对社会主流价值和意识的认同,成为真正意义上精神饱满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都要求大众参与文化的生成、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要求文化生产去面向大众、为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而服务,实现大众在文化发展中深度而广泛的参与,这就是文化的人民性价值和大众化生存方式。

当代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存在并发挥作用。但资本逻辑“不是泛指资本的所有属性,而是特指资本自我增殖、追求利润最大化、惟利是图和不断扩张的自由本性”^[5]。追求利润是资本最根本的属性,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不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可能会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牺牲产品的文化价值担当和艺术品位,迎合大众的低俗文化需求。同时,资本还可能会以自身增殖需要为根本来塑造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通过电影、电视、移动终端等现代传播手段,在文化类产品的内容中植入资本增殖所需要的消费价值理念,从而扭曲大众的消费理性,使其消费的目的偏离自身内在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片面追求商品被资本所形塑的符号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商品所应有的人文价值被资本逻辑所消解。

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离不开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的积极扬弃,但在当代中国的时空语境中,我们需要在承认资本在文化生产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力量来规范和约束精神生产主体的行为。既充分利用资本力量发展文化生产力,又设计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引导和控制资本在文化生产中的介入和具体作用过程,遏制资本的负面效应,从而在产业化的精神生产中,实现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三、扬弃资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向

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从经典文献中汲取关照现实的理论资源,建构一系列的机制,保障在文化生产实践中有效扬弃资本,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

(一) 明确制度构建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化路向

理性是启蒙精神的核心,曾在历史上起到过帮助人们摆脱神权统治和封建枷锁的作用,是人之为

人的基本规定性。在应然层面,理性应该完整、全面,涵盖发现人、解放人的内在精神的全部内容。精神生产应蕴涵人的理性内容,为人的理性发展服务。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中,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理性被片面地发展为“工具理性”,将精神生产甚至人本身都作为了资本增殖的手段。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制度要在生产力、分配制度、大众观念体系等方面不断发展进步,为一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在文化方面,就是要充分重视并努力彰显文化的人的本质,让文化的社会属性、教化功能充分发挥,提升人的品味和精神世界,使文化更好地为解放人、发展人服务。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生产的重要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要想健康发展,在制度构建的根本性价值路向上,要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化,扬弃资本逻辑规定下的工具理性内容,强调文化的价值性内容,坚持精神文化生产的人化本质和推动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

(二)完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巴黎手稿》从工资开始观察劳动者的生存现状,指出异化劳动是劳动者生存困境的直接原因,异化劳动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使劳动者的主体性无法彰显,居于被支配和剥削的位置,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异化劳动,才能为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奠定制度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形态就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制度样态表现在精神生产领域,就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存和互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当前我国的文化事业主要指向那些具有强外部性的公共文化产品提供,这对保卫国家的文化安全、提升民族的文化素养、满足大众精神世界的基本需要至关重要。但在生产实践中,公共文化产品因为外部性太强而缺乏垄断并盈利的空间,或者以付费的方式限制国民此种消费,对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可能的收益,需要由政府等公共组织出面,以公共财政来组织此种文化产品的生产,产出后无偿或仅以成本价格提供给广大群众消费,以获得社会文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事业性的文化生产,也就是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必不可少,但单一的文化事业生产方式也存在许多弊端。如政府投入难以适应大众急剧扩张的文化需求,文化生产计划者难以应对大众多变多样的文化欣赏需求,评判缺乏客观的标准使文化生产者难以及时得到激励等问题。因此,在当前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化的文化生产形态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构成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体系。

是否以盈利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根本区别,文化事业注重文化生产的社会效益,文化产业注重文化生产的经济效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事业在任何时候任何程度上都不能盈利,有些准公共产品提供型的文化事业,其所生产的产品也可以在文化市场上被消费,如果其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市场普遍欢迎,也有盈利的可能,如一些主旋律影视的制作。只不过文化事业在生产文化产品时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获利则其盈利主要用来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本身。同样,从文化产业的层面来说,其生产时存在盈利的目的,也不意味着文化产业只应关注盈利目的而忽视文化产品的价值承载和社会教化功能。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强调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文化事业是“为国家政治、经济之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服务作用的,是引导整个文化进步的先锋性文化。文化事业导向和滋养着文化产业的发展”^[625]。产业化形态的文化生产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容易忽略文化的社会主流价值担当,许多缺乏获利空间的公益性文化需求,资本也缺少介入生产的驱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文化事业体制依然要发挥重要作用,以充分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引导社会主义文化彰显其应有的价值本质。当然,在一些文化应然的价值担当领域,文化的社会效

益通过文化事业的方式得到保障,文化产业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也可以减少许多阻力,轻装上阵。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满足当前大众文化需求,实现文化价值使命担当的过程中,优势互补,缺一不可。

(三)建构对文化产品的价值性内容进行审查的合理机制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明确了人在精神生产中的主体性存在,指出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要在对人潜移默化的教化中彰显人的本质性力量,传播内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资本在当前精神文化生产领域内广泛介入有其历史合理性。但资本逻辑也可能驱动文化生产者放弃对大众进行价值引领的文化使命,片面迎合大众较为低俗的文化消费心理需求,生产大量不良文化产品,消解大众对传统和主流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同,破坏人们对当前的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尊重,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精神上的空虚甚至异化、扭曲。因此,除以文化事业直接引领大众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在资本介入下的文化产业领域,同样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力量,建构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性内容审查机制,保障产业化形态生产出的文化商品依然能有效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阶级社会中,形式不同的文化产品审查机制一直存在。就我国而言,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具有传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担当。要完善针对文化产品进行价值性内容审查的机制。根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设定恰当的评判标准,审查大众文化产品的内容,禁止那些诲淫诲盗和反动的内容,对不适合儿童等特定群体的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群体方面的限制。其次,任何文化产品都蕴涵着特定社会体系下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对于外来文化产品,如果不加区别、毫无限制地引入,人们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会在精神层面一定程度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自觉地接受文化产品生产国的价值理念、制度体系和生活方式,从而冲击我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安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尚不发达,面对发达国家成熟的文化产业作品的冲击,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因此,通过完善对外来文化商品的文化审查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卫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当然,审查是公共权力对文化生产行为的外部干涉,如果不对文化的审查确立明确的规则、限定其行为的边界,文化审查权力将可能被滥用。文化是人内在精神对社会素材编辑后的自我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自由的,如果文化审查权力被滥用,文化产品的创造将动辄得咎,从而扼杀文化生产内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力量。因此,我们在建构文化审查机制时应当充分听取文化生产者的意见和建议,尊重文化创造的自主空间,负面清单的方式也许可以作为我们文化审查机制建构的基本方式。同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文化审查的制度,将审查的标准细化并公开化、法制化,以此来明确文化审查权力的边界,防止文化审查权力的滥用,保障文化审查机制充分发挥正面效应。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针对文化生产的微观主体,从文化市场的准入机制、市场标准体系等入手,明确各方责权利内容,优化各种资源和要素的供给体系,使相对宏观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赋予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平台、以相关制度体系为各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和基本遵循的文化生产共同体,在文化生产领域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72.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朱贻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是否还存在“资本逻辑”?[J].社会科学,2008(3).
[12]鲁品越.资本是手段,掌管者赋予其道德属性[J].社会科学,2008(3).
[13]马克思.资本论(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15]张艳涛.现代性生成的深层主线——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
[16]张彩凤,苏红.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The Contemporary Domain and Practice Direction of the Thought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in *Paris Manuscript* NIU Tao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economic fact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Paris Manuscript*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capitalism in the field of non-material production", reveals the subjective nature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t the level of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criticizes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alienatio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It is clear that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possession is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thus pointing out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the socialist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practice with subjectivity. Us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alysis tools provided by Marx in *Paris Manuscrip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stands the ration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apital under the existence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understands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value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cultural logic.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rom three aspects: clarifying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wnership system of complementary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onstructing a reasonable mechanism for reviewing the value content of 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 *Paris Manuscripts*; Thought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Sublate Capital

责任编辑: 嵯丽华